

大禹在淮南治水传说的文脉传承

杨道文

淮河从桐柏山发源，一路东流，到淮南地界拐了几道弯。这条河养人，也发脾气。老辈人讲，从前每逢汛期，河水说涨就涨，两岸村庄说没就没了。庄稼人对这条河，是又敬又怕。

四千多年前治理这条河的人，叫禹。

关于大禹在淮南治水的故事，凤台人能讲，寿县人能讲，大通的老人也能讲。故事代代相传，有些变成了山名、村名、庙名，有些写进了州志县志，还有些至今挂在老百姓嘴边。这篇文章想说的是：这些故事不是零散的闲话，它们连起来，是一条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文脉。

一、因时因势改堵为疏，还原大禹在淮南治水的史实

上古时候治水，最早的办法是堵。哪里决口堵哪里，可淮河流域地势低洼、水系交错，堵了东边漏西边，越堵越糟。大禹的父亲鲧用这个办法治了九年，没治住。

大禹接手后换了思路，不堵了，改疏。水往低处流，那就给它找出路。

这个思路说来简单，做起来要下死功夫。禹得先把地形水势摸清楚：哪里的山挡了水路，哪里的河淤了河道，水从哪里来、往哪里去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及江淮各地——“原道训”“地形训”“修务训”里都留有相关记述。

淮南这段淮河，卡在一个要害位置。凤台境内的硖石山横在淮河干流中间，上游的水下不来，越积越高，两岸成了泽国。这是当年整个淮河中游最大的症结。大禹的治理方案，说到底是一件四事：开山、拓宽、疏浚、导流。山挡路就劈山，河淤了就清淤，让壅住的水有地方去。

禹会涂山氏的故事也和这片水土有关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里禹自述：“予辛壬娶涂山，癸甲生启。予不子，以故能成水土功。”大禹娶妻四天就离家赴职，孩子生下来也没顾上抚养。后来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典故，就是从淮南一山之隔的蚌埠流传出来的。

要说这些传说有多少是信史，今天没人能打包票。但有一点是实在的：禹治水的因势利导、系统治理的思路影响了后世几千年。淮南人记住的不只是一

个上古英雄，更是一套和水打交道的办法。

二、遍布淮乡山水留名，大禹在淮南的治水传说与遗存

大禹在淮南的传说，不是只有一处两处。凤台、寿县、大通都有，而且各有各的故事、各有各的实物。这些禹迹连起来看，恰好是一条从干流到支流、从山川到村野的治水路线。

凤台的传说最成体系，也最有看头。

故事说，大禹治淮河顺流而下，进了凤台地界，被八公山脉西麓第一山硖石山挡住去路。淮水过不去，回旋泛滥，方圆百里成了汪洋。大禹向天帝要了把神斧（一说挥动神鞭），将硖石山劈成两半，分成东西两硖，淮水从此穿峡而过，奔流入海。这就是千里淮河第一峡硖山口的来历。

传说的细节各有各的讲法，凤台民间还有“楚霸王鞭打硖山口”的另一版本。但光绪十八年《重修凤台县志》的记载值得细看：“硖石两麓交错，阻遏，禹凿宽，两本山而疏之，非一山凿而两之也。”意思是：硖石山本是两山相连，大禹凿宽了中间的阻隔，疏导水流，并不是真的一斧头劈成两半。古人写志，比传说冷静得多，反倒更接近工程本身的样子。

凤台人是怎么纪念大禹的？看地名就知道：劈山之处，山被尊称为禹王山；淮水北岸的防洪堤坝，叫禹山坝；西硖石上曾建禹王庙，据明嘉靖《寿州志·杂志记》记载，庙原在硖石山之东，后迁至山西侧。庙早毁了，后人在旧址附近建了禹王亭，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重修，后来改名慰农亭，如今是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今天的慰农亭还在，在西硖石顶上，四柱方亭，石柱石栏、翘角飞檐。亭柱上刻着一副对联，为清代凤台知县颜海庵手书：

“选胜值公馀，看淮水安澜，硖山拱秀；系怀在民隐，愿春耕恒足，秋稼丰登。”上联看景，下联惦记的是农事民情。一座纪念治水英雄的亭子，最后落点在“愿庄稼有个好收成”，这大概就是淮南人对大禹最朴素的理解。亭子旁边那棵古皂荚树，虬枝横空，和慰农亭一

起列入了“州来八景”。

凤台的大禹遗存还不止这些。老县城下蔡镇（古州来国都）历史上建有禹王宫，规模不小，可惜没留下来。县城北边的顾桥镇，流传着大禹治理西淝河时斩杀河神、镇锁水患的神话，当地清末建有禹王庙，2017年镇政府又重建了一次。

寿县的水情比凤台更复杂，淮河、淝水、淠水在这里交汇。传说大禹治理淠河水患时，路过迎河镇，赶上暴雨，就在一处高台上避雨。当时淮水暴涨，硖山阻流，七十二道河水壅在正阳关下不去。危急关头，禹连挥三鞭，劈开硖石，让壅住的水顺利归流。

大禹驻留避雨的那个村子，后来就叫禹临村。村里曾建有禹临寺，殿宇辉煌，香火延续到民国，毁于战乱。寺没了，村名还在，故事也还在。

淮南市区东部，舜耕山脉里也有一座禹王山，在大通区大通街道境内，夹在大通山与石婆山之间。它和凤台的禹王山一西一东，隔城相望。

有意思的是，淮南市的舜耕山传说是舜帝耕耘过的地方，而舜恰恰是把治水大任交给禹的那个人。舜、禹在这个地界留下的印记，一东一西，算是淮南拿得出手的上古人文资源。

三、讲好大禹故事，新时代淮南大禹文化传承与发展

大禹留给淮南的，不只是一段治水功绩和几处遗迹，还有故事里那股子劲头：水堵不住就去疏，难题摆在眼前就一件一件去解，家可以不回，事不能不办。这笨账怎么算，都算精神财富。

传说不能只在故纸堆里躺着，也不能只在老人嘴边挂着。这些年，淮南在大禹文化上做的文章，大致有三个方向。

先说摸家底。地方文史部门对照《寿州志》《重修凤台县志》等明清方志，把境内的禹王山、禹王庙、禹王宫、慰农亭、禹临寺挨个普查登记，同时抢救整理民间的口述传说——老人们一个一个故去，故事少记一个，就永远少一个。这些材料收拢起来，淮南的大禹文化才算有了系统的家底。

再说讲故事。大禹治水的传说进了校园宣讲、社区展览，也成了本地文化

研究的课题。讲这个故事图什么？图的是里头两样东西：一是尊重自然、因势利导的治水智慧，二是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责任心。这两样放到今天，一点不过时。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几千年，故事里的品格，慢慢就长成了城市的品格。

最后说串联路。淮南的禹迹是散落的：硖山口在凤台，禹临村在寿县，还有一座禹王山在大通。文旅部门的思路，是以硖山口慰农亭、禹王山、禹山坝为核心，把顾桥禹王庙、寿县禹临村等点位串成一条大禹文化主题游线，配上淮河风光和沿淮民俗，打出“大禹治淮，始在淮南”的名号。这条线如果做起来，和寿州古城、八公山的旅游正好互补，游客看完楚文化和汉文化，再看四千年前的大禹，淮南的历史纵深一下子就拉开了。

平心而论，这条游线还在起步阶段。多数遗迹体量小、知名度低，单靠禹迹本身撑不起客流，得和淮河生态游、沿淮乡村旅游捆在一起做。但方向是对的，先把东西保住，再谈利用，别急着变现。

硖山口今天还在分洪。淮河河道拓宽以后，西硖石成了河中心的一座小岛，岛影如竈，当地人引以为景。上游不远处，是新中国治淮工程留下的水利设施；再往前推七百多年，西硖石的峭壁上还留着南宋咸淳十年（1274年）的筑城摩崖石刻，记的是那个年代的兵事。

一座硖山口，从大禹的传说，到宋人的石刻，到清代的慰农亭，再到今天的堤防、水库、行蓄洪区，四千年治淮史，在这里叠成了一层一层的年轮。

古人于淮患所苦，把希望寄托在挥鞭劈山的英雄身上；今人不靠神鞭，靠的是一套套防洪调度体系。工具变了，治水的道理没变，还是那四个字：因势利导。这是大禹留给淮南，也是留给整个中华民族的老家底。

沿淮的城市不少，把大禹故事记得这么全、讲得这么久的，不多。禹王山、禹山坝、禹临村等，这些用“禹”字冠名的地方，正是文脉的实物注脚。山川不改名，香火有延续，故事一直在讲。一个城市有这样一条从上古绵延至今的文脉，是一份难得的底气。淮水东流四千年，只要这条河还在流，这个故事就会一直讲下去。

从楚国兴衰看六国“合纵”之败

时本放

战国时期，曾以合纵之势覆压海宇的六国，为何不敌秦国？对此，历史学家早有评说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楚国为例，认为：“怀王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祸也。”然后，司马迁又以张仪“六百里与六里”的故事，以责楚之不明，而受秦连横之欺。

而宋代苏辙则认为，韩、魏的地理位置是决定六国合纵成败的关键。

由此看来，人之祸，地之蔽都是六国合纵失败的原因，而根本原因还是六国人心之散。

早在春秋初期，大大小小共有一百多个诸侯国，到了战国末期，大国仅剩七个，史称“战国七雄”。七雄中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吞并八方、一统天下之心。

最南面的是楚国，面积最大，人口最多，经公元前506年吴楚之战和公元前278年秦楚之战，楚顷襄王及朝廷一蹶不振，仓皇北顾，将政治中心从长江流域迁至淮河流域，以避秦锋；齐国东近沿海，盐业支撑国家经济命脉，成为六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，在秦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影响下，却仰仗秦人，习惯于“壁上观”；赵国经过“胡服骑射”的改革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，占据高原，俯瞰六国，拥兵自重；魏国是最早强大起来的国家，占据中原，沃野千里，极具先发优势，却妄自尊大。

纵观会盟的六国君主，楚国从楚怀王开始，六代君主基本都是昏庸无能之辈，且战且退；齐国从齐愍王开始，也是庸君当道；魏国只有战国初期的魏文侯算是一代雄主，之后的君主，要么出现重大决策失误，要么就是享乐玩物，如魏惠王，就是个玩乐、围猎的高手。到了关键时刻，虽有少数国家不堪凌辱而想奋力抗秦，但要么力所不及，要么积重难返。反之，秦国从秦孝公开始，经历了惠文王、秦武王、昭襄王、庄襄王、秦始皇，一代接一代，“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答天下，威振四海。”秦六代国君，都是励精图治、出色的君主。

六国看到秦不断强大起来，魏国率先发起“五国会盟”，联合其他五国，图谋灭掉秦国。而此时魏国宰相庞涓，就是后来被孙臆聚歼于马陵道的魏国驸马，却有自己的长远打算，先借他国之力灭秦，然后再逐一消灭剩下的五国，完成统一霸业。由此包藏祸心的东道主领导联盟，自然是各有各的打算，怎会有战斗力呢？

公元前237年，也就是楚怀春申君黄歇被害的第二年，秦王嬴政和国相李斯定下了一统六国的大计，开始了他们的“先胜而后求战”的十五年征战计划，实际只用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统一。

那时，人们只看到秦国的强盛，是实施了商鞅变法，可楚国也有过吴起变法，魏国有过李悝变法，齐国和韩国也推行了变法，最后只有秦国变法使国家强盛了起来，说到底还是国家治理问题。除了变法，秦国有三对“明君+能臣”的绝配组合，在保障和助推变法的实施，正是有了他们接力式的励精图治和资本积累，才使秦国具备了兼并东方六国的实力，为秦始皇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第一对最佳组合是秦孝公和商鞅。秦孝公继位不久，下了一道“求贤令”。

那位旷世奇才商鞅，原名卫鞅，从魏国来到了秦国。秦孝公与商鞅相见，一谈就是三天三夜，共谋兴国之策。商鞅侃侃而谈，思潮汹涌，呼啸奔走，流淌着自己，燃烧着自己；而作为国君的秦孝公，则如空谷沧海，接纳着他无尽的奔流。俩人惺惺相惜，肝胆相照，自此，秦以“商鞅变法”为契机，开启了大秦帝国往后一百五十余年辉煌的新篇章。

秦惠文王和丞相张仪是第二对最佳组合。如果说商鞅的大手笔是“内政”，那么，张仪最大的贡献是“外交”。“连横”作为秦国主要的外交军事手段，张仪是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。他极其善于游说，推动与东面各诸侯的结交，以瓦解六国的“合纵”攻秦的联盟。当时“合纵”的操盘手是公孙衍，名声和影响力不下于张仪。两个人在斗法，两种策略在博弈，最后还是“连横”彻底瓦解了“合纵”，这是因为“合纵”的六国集团，各自心怀鬼胎，时刻将自家利益放在首位，导致“合纵”最终破产。

秦的第三对绝配组合是昭襄王和丞相范雎。昭襄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，他上承秦孝公商鞅变法的图强之志，下开秦始皇统一中国帝业的辉煌。而作为丞相的范雎，他的大手笔是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，这是因“合纵”的六国集团，作为秦进攻和兼并的主要打击目标，同时与齐、燕等国保持良好关系，以形成东西夹击的威慑之势，“使天下皆畏秦”。

正是秦六代君臣励精图治、精诚团结、锐意变法，使秦国取得了军事和外交上的极大成就，同时国内政局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国力强盛，基本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实力，造就了“东出马踏六国，归来鼎定天下”的局面。

由此，我们看到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，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，赓续奋斗，才能鼎立于世界。战国时期，六国的灭亡，韩、魏等国的地域固守、国君明于忠臣之分固然重要，但六国没有注重自身建设，没有形成持续强大的“合纵”力量，才是日趋于亡的根本原因。

秦固定下统一六国大计是在楚国发生重大变故后的第二年。公元前241年，春申君佩五国相印率军第五次合纵攻秦，结果功亏一篑。为避秦锋，楚考烈王将都城迁往寿春，迎来了一片新的曙光。尔后，春申君远去了江东，在那里开辟了新的天地，这是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，可楚国让这个机遇悄悄溜走了。

历史不容假设，往往会让人扼腕叹息。假如楚迁都寿春后，君臣一心，内修政理，外树形象，重武强军，发展生产，增强国力，则秦楚胜负，或未易量。秦将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，不是被项燕率军大破吗？假如春申君尚在，秦或许不会冒然定下统一六国大计。退一步看，假如楚军死战不利，可退守到他们的大后方——江东，偏安一隅，与秦抗衡。江东有天堑长江之险，有春申君十多年的开发基础，有辽远的山河土地，这是其他五国所不能企及的，遗憾的是，楚迁都寿春后，朝政没有这样的战略方案，而春申君作为令尹竟数年在外，不常参与朝政，让奸佞小人有机可乘，以至家破国亡。

当然，分久必合，是历史规律，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历史早已暗淡了刀光剑影，远去了鼓角铮鸣。但我们从六国合纵的失败和亡国的哀鸣中，或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。



河畔黄昏

沈庆功 摄